

从城南走来

林海音传

夏祖丽著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从城南走来

——
林海音传

夏祖丽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 夏祖丽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3.1
ISBN 7-108-01705-9

I. 从... II. 夏... III. 林海音—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380 号

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著 / 夏祖丽

责任编辑 / 张 荷

整体设计 / 海 洋

出版发行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 10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14.5 印张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数 / 00,001—10,000 册

图 字 / 01—2001—5459

书 号 / ISBN 7-108-01705-9/K · 353

定 价 / 36.00 元

(二九二)

總有一天，我要在別的世界的早晨
照裡對你唱道：「我以
前在地球的光裡在人的愛裡，已經
見過你了。」



“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林海音看到画中这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男孩捂着脸哭泣，忍不住也红了眼眶。（“迷途”（Lost），Frederick McCubbin绘，现收藏于澳大利亚国立维多利亚画廊。（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回向的拥抱

——给祖丽

席慕蓉

你是怎样开始的呢 怎样
提起笔来 写下
那第一章第一行的文字

为母亲立传
应该像是一种回向的拥抱吧
就如海浪一次又一次扑向
光明温暖洁净的沙岸

母亲给了你的 此刻
你是如何真挚与爱慕地
再一一地还报给她

而光影杂沓 在往昔的笑声里
也许 有泪水会静静滴落
留在纸上 晕染了字迹

“从城南走来……”

从生命里最早最早清晨走来
从黄鸟叼签算命那最初的预言走来
在每一个转角之处 你再三回首
重新去追寻那一切记忆的源头

就是这样慢慢铺展开来的吧
从童年到青春 和
之后如锦绣般华美的文学岁月
永远的英子 永远的林海音
其实早就走进了我们的心中

只是 在你的笔下
她光华更加从容

而你又是怎样把书拿给她的呢
母亲还在身边 还能
迎接着你的目光向你微笑
你是怎样把书翻开 把灯点亮
和她一起重新走进
那在我们的文学史上
永不消逝的 盛宴

在窗外是逐渐暗下来的暮色
在岛屿的边缘是永不停歇的海浪

二〇〇一年六月

生命的寻根之旅

郁 风

祖丽为了写母亲林海音的传记，于1999年特地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第一次飞来北京，追寻母亲幼年成长的足迹，她称此行为寻根之旅。

北京，是林海音幼年成长、度过花样年华、结婚生子、直到将近三十岁才离开的地方，也是她毕生怀着切肤之亲的地方。而这本《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也成为作者——传主的女儿省视生命的寻根之旅。

这本传记的最大特点，我以为是：全书以两种口吻来叙述，一种是以评论家的眼光、文学和历史的尺度，来论述传主的作品、作为、性格、环境，并引用文坛其他资料，说得头头是道；而穿插在每一

章中，却有另一种：以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和心情，娓娓而谈，天真、亲切，从最细微的小动作，用从母亲学来的漂亮京片子语言，活生生勾画出一个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勇于奉献的母亲林海音。

祖丽不但是传主的女儿，而且是在林海音中年的主要事业——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工作中，十年相对而坐的助手。她不但熟悉母亲的一言一笑，也深理解和承袭着林海音的工作作风，写来也就特别真实生动。

与海音结识可追溯到一段往事：

一九五六年，苗子因叶恭绰前辈之介，数度到北京永光寺街拜访过海音的先翁、国学家枝巢老人夏蔚如（仁虎）先生。当时老人已八十多岁，视力衰退，但十分健谈，上下古今滔滔不绝。当时正好报载丧失千年的“广陵散”旧谱在某地寺庙中发现，老人因此絮絮为道“广陵散”自嵇康以后传谱经过，苗子聆之神往。老人并出示毛润之（泽东）向老人请教“广陵散”的来往信函。

一九八六年苗子写了篇文章介绍他喜爱的夏仁虎先生的《旧京琐记》，并道出这段三十年前拜访老人的往事。后来这篇文章辗转到了在台湾的海音、

夏承楹（何凡）的手中，于是，她特别通过香港《良友月刊》的马国亮及董桥两位朋友转信和书给我们。其中就有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夏仁虎先生的《旧京琐记》及《清宫词》，从此开启了我们之间多年的通信。

一九九〇年海音及夏先生到澳大利亚墨尔本，探望二女儿夏祖丽及女婿张至璋一家。当时我和苗子住在两千公里外的布里斯班，这才第一次和海音通上电话，直接听到海音的京味声音，爽朗亲切。我们年龄相仿，处在同一时代，在北京有许多当年共同的朋友，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海音因此写了一篇《南十字星下的讯息》，记下我们之间这段三代情的因缘。后来这篇文章连带我和苗子给她的信，收录在她的《写在风中》这本书里。

那些年，常常收到海音的信和书，在澳大利亚则常和祖丽通话。每次收到海音的书，我总是翻翻这本，又读读那本，真是放不下手。虽然这些书在时间上跨过几十年，但我的理解和心情都跟得上。她的长篇小说《晓云》里，把那个敏锐又痴情的晓云，从里到外写得呼之欲出，使我重新感觉到自己年轻时对母亲和周围社会的背叛心理。谎言和负

疾成为我们那个时代女性的家常便饭，直到自己做了母亲，甚至祖母，才真正体念到自己母亲当年的心思。

人说，林海音家就是台湾文坛的一半，海音那握笔的手，除了提携文坛后进，还把照顾先生和拥抱孩子当作天然乐事。她为老伴儿夏承楹写了三十多年的专栏及一生的作品六百万字编成《何凡文集》出版，在他们俩的影响下，全家三代竟有八位成为有书出版的作家！我不禁惭愧想到，曾经被我青年时代自以为革命的思想所鄙夷的“贤妻良母”这个词儿，已由林海音赋予全新的意义。

一九九〇年后海音多次到北京，但我们都失之交臂，没能见着面，这是我和苗子最遗憾的。想想是很奇怪，我们生活中经常见面的人很多很多，但未必都了解；可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却自以为非常了解，而且感觉很亲很亲，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这个感觉大概是从二十年前看了《城南旧事》电影就开始了，而在十年前和她通信，看了她写的另一些书之后慢慢加深的。

她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同是二三十年代，同在

一个古城北京，连家庭环境都那么相似：有父亲母亲和一群弟妹，自己是老大；有旧文化传统，上一代去过日本，呼吸了新鲜空气回来。她今年八十三岁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却是八十五岁。当我回忆我的童年时，隐约出现的情景，已经分不清是我自己的经历还是《城南旧事》中的影像。说明我看了这作品的感动深深印在心中，已成为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她的作品的魅力。

她写了那么多故事，塑造了那么多生动的女性形象，新旧时代交替的各种典型。她不是以悲欢离合赚读者眼泪，而是以悲天怜人的情怀，和对性格的赞美，使人深深感动。

这本传记记叙了她的全部创作、事业、家庭、社会交往，但是着重地写了那不朽的《城南旧事》，它的创作根源，它的独特的文学风格，一个小女孩“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的悲惨的大世界”，以及此书出版后的社会影响和国际文学界的评论。

此外，贯穿全书的是那数十年来历经沧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温馨、开朗、奋发，相亲相爱。这个家庭以林海音为轴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

永远在快乐中运转。祖丽说，直到写母亲的传时才发现：“我的童年从来没有丢失过。”她说到父亲夏承楹：“他泡的好茶就像他那个人，溶入了多少代中国家庭的书香，是要慢慢品味的。如果说母亲是太阳，父亲就是月亮，他们的光日夜照射着这个家，这家里的孩子是有福的孩子。”

我没有女儿，很羡慕林海音有如此贴心的女儿
写出她的传记。

二〇〇二年九月于北京

另一段城南旧事

余光中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十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一九六一年，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

过汀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导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斯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夏承楹）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

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出彳不卷，尸么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艺儿”说成“什么玩艺”。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磊、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